



城乡信息公平 与和谐社会建设

——以三网融合背景下重庆城乡数字鸿沟为例

hengxiang

Xinxi Gongping yu Hexie Shehui Jianshe

Yi Sanwang Ronghe Beijing Xia Chongqing Chengxiang Shuzi Honggou Weili

邬建中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城乡信息公平 与和谐社会建设

——以三网融合背景下重庆城乡数字鸿沟为例

Chengxiang

Xinxi Gongping yu Hexie Shehui Jianshe

Yi Sanwang Ronghe Beijing Xia Chongqing Chengxiang Shuzi Honggou Weili

邬建中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燕
责任校对:喻 震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以三网融合背景下
重庆城乡数字鸿沟为例 / 邬建中著. —成都:四川大
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614-9733-3

I. ①城… II. ①邬… III. ①城乡建设—信息资料—
资源共享—研究—重庆市 IV. ①F299. 277. 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69493 号

书名 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

——以三网融合背景下重庆城乡数字鸿沟为例

著	者	邬建中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733-3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7. 2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 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国内外城乡数字鸿沟现状	(10)
第一节 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现状	(13)
第二节 欧洲地区城乡数字鸿沟现状	(15)
第三节 美国城乡数字鸿沟现状	(18)
第四节 各国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相应对策	(24)
第二章 中外城乡数字鸿沟研究现状综述	(33)
第一节 国内城乡数字鸿沟研究现状综述	(33)
第二节 国外城乡数字鸿沟研究现状综述	(43)
第三节 国内外城乡数字鸿沟的主要研究方法	(55)
第三章 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调查基本状况	(71)
第一节 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调查概况	(71)
第二节 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调查数据分析	(74)
第四章 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的现状特点	(109)
第一节 第一道数字鸿沟——城乡数字接入沟	(109)
第二节 第二道数字鸿沟——城乡数字获取沟	(116)
第三节 第三道数字鸿沟——城乡数字使用质量沟	(129)

第五章 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形成原因分析·····	(133)
第一节 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实证调查·····	(133)
第二节 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形成原因分析·····	(143)
第六章 缩小重庆城乡数字鸿沟的相关策略·····	(150)
第一节 紧跟时代，转变观念·····	(150)
第二节 准确定位，平台为先·····	(157)
第三节 加强教育，有所创新·····	(169)
第四节 科学推广，讲究实效·····	(174)
第五节 良性循环，持续发展·····	(183)
参考文献·····	(189)
附录一 城乡信息传播调查问卷·····	(206)
附录二 城乡信息传播回访问卷·····	(213)
附录三 城乡信息传播调查问卷·····	(217)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谐社会建设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目标。正因为如此，党在第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谐”一词，有和睦、协作、融洽、协调之意。“和谐社会”就是让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和各个要素都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

而要达到上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城乡信息公平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在信息时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各种活动都离不开信息获取。特别是在当前，不稳定因素不断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公平工作做得不够，城乡居民在信息获取机会和信息获取能力上都存在差异，从而造成对实际情况的误

^①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解。同时，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公平，将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特别是在进入大数据时代后，各种媒体间的差别因媒介融合的驱动而渐渐缩小，很多媒体不再是内容提供商而只是数据处理商。任何人都是一个数据入口，其任何活动都在不经意间受到信息公平与否的影响。因此，信息公平上的差异因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被进一步放大，信息公平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从没有像当前这么重要。

在信息公平领域，传播学存在“知沟”理论。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纳等人提出了“知沟假设”，对大众媒介普及时代信息流通的均衡性，公众在知识获取方面的平等性提出了质疑。该假设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长，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①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特别是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知沟”又以数字鸿沟的形式表现出来。1974年，卡茨曼根据数字技术的发展创立了“信息沟”理论，主要观念如下：（1）新传播技术的采用将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接触量增大，这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如此。（2）新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是均等的，现有信息水准较高的人能得到更多的信息。（3）与人的能力相比，机器的信息处理能力要大得多，信息富裕阶层通过早期采用和熟练使用这些机器，能比其他人更拥有信息优势。（4）新技术层出不穷，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可能是老沟未平，又起新沟^②。

而对于数字鸿沟的定义，学界存在一定争议，但一般从两个

① 丁未、张国良：《网络传播中的“知沟”现象研究》，《现代传播》2001年第6期。

② Katzman, N., The Impact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romise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74年版，第47~58页。

方面进行讨论。一个方面是基于对“数字”一词的具体理解——数字鸿沟从狭义上说,特指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间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上的差别。美国商务部发表的《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系列报告是这一定义的代表^①。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对这种定义并不赞同。他们认为,从广义上说,数字鸿沟中的数字一词所衡量的指标,不应只有互联网,还应包括其他现代传播技术,如电话、有线电视、电脑、传真机、手机等。所谓数字鸿沟,即在信息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贫富差距”。本书选取后者作为数字鸿沟的定义,并把数字鸿沟作为“知沟”在当前大数据时代新的表现形式来进行研究^②。

综上所述,重庆城乡数字鸿沟是在大数据时代影响重庆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关键因素之一。我们从重庆城乡数字鸿沟的角度,对重庆城乡数字鸿沟的现状、原因等展开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进而为我国的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建议。

二、研究目的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是“理论本土化”,对当前数字鸿沟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对其不足和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本土化”基础上进一步“本地化”。本书作者由于学识与能力的限制,无力以全国为范围来研究数字鸿沟理论的本土化。因此,我们选取了重庆市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通过近五年的

^① 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11页。

^② 邬建中:《重庆地区“知沟”问题调查及对策研究》,重庆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8年5月。

时间和数次大规模调研，对重庆市的数字鸿沟问题进行了首次较为详细的研究。

重庆市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也是我国“城乡统筹配套试验区”，其大农村、大城市的二元结构较为明显。因此，对重庆的城乡数字鸿沟进行研究，一方面将促进重庆市的城乡协调发展，进而带动整个西南片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对我国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进程提供有益借鉴。因此，以重庆数字鸿沟为例研究重庆城乡信息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1) 通过此课题的研究，对重庆地区城乡“数字鸿沟”进行首次较全面的调查，了解重庆地区城乡居民在获取信息能力上的差距现状，并在此基础上为缩小城乡“知沟”，促进重庆地区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出相关对策。

(2)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对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数字鸿沟”理论进行本土化吸收和利用。“数字鸿沟”理论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在重庆的实际情况下对“数字鸿沟”理论进行验证和考察，对“数字鸿沟”理论进行本土化消化，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进一步的方向。

三、研究思路

本书从重庆市城乡受众社会经济地位和媒介接触的差别对媒介传播效果的影响入手来研究数字鸿沟，从宏观到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第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及传播能力；第二，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征，包括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等；第三，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个人的基本群体（如家庭交往、社会关系）及次级群体（如工作单位、学校、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

本书研究思路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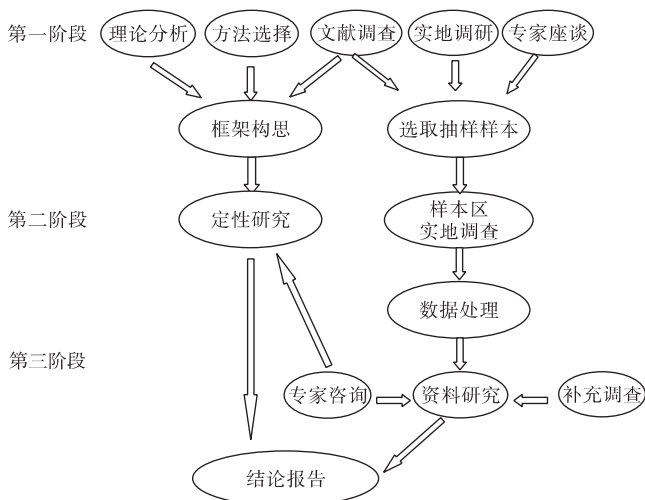


图 1 本书研究思路

本次研究从居民的媒介基本使用情况以及媒介与个人选择的关系两个方面入手,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全面调查了调查对象对手机、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使用情况。最后考察了媒介与个人选择的关系,通过分析居民对媒介的熟悉及使用情况,从量化上考察城乡间的数字鸿沟;通过居民自身对媒介的认识、对鸿沟差距的认识及客观测量结果,探究当下重庆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是否真实存在。若城乡数字鸿沟确实存在,则其具体表现形式和特征是什么?其形成的原因是基于个体因素还是社会结构因素?是否能够采取相对应的措施减缓甚至消除城乡数字鸿沟?从历时数年的三次调查中,是否能够得出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变化的趋势?

四、研究方法

作为一个较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有必要对课题组调查研究的

方法和过程作一说明。本次调查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结构化问卷的形式对重庆城市及农村居民数字资源接入与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同时进行访谈。

本次研究主要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为问卷调查法，用于采集研究需求的基础数据。通过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书面形式的访问，设计出一系列问题，让受访者回答问题以此获得间接调查信息。大规模问卷调查一共进行了三次，分别为2012年7月的第一次调研，2013年4月的第二次调研以及2015年1月的第三次调研。三次问卷调查的问卷内容大致相同，但第二次调查以及第三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是根据近年来互联网等领域出现的新发展设置的一些相关问题，以此来考察被访者对新技术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总的来说，三次问卷调查能够反映当时城乡居民数字化程度及当时数字鸿沟的状况，而通过对两次问卷调查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对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的发展与变化做出一定程度上的解读。

访谈法是本次调查所采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对调查对象进行访谈，以了解他们对媒介的使用和认知情况。访谈法更直观，且可作为对调查问卷的一种补充说明。通过对调查对象的访谈，我们可以对量化的数据进行纠正和补充，从而得出更有效的结论。我们的访谈对象选自农村和城市两个群体，以期了解不同群体间以及同一群体内部在信息化潮流中对信息的应用技能、态度和自我认知上的特点和区别，以便能够对城乡数字鸿沟产生的具体情况做出说明。

三次大型调查的调查对象为重庆市主城六区（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北碚区、南岸区、大渡口区）以及綦江、云阳、垫江三个远郊区县。主城六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略有差异，综合考察其数字资源的接入与使用情况具有全面性，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城镇居民的数字资源使用状况。农村的调查对象为

綦江、云阳、垫江三个区县，其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主城区的平均水平，但其内部也有不同程度的差距，能够相对全面地反映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村地区的数字资源接入与使用差异情况，以便更加有效地研究数字资源接入与使用对农村居民获取和利用信息产生的影响。

对问卷调查所获数据采用 SPSS20.0 软件进行分析。对于单变量，我们用描述统计的方法进行百分比、累积百分比的描述分析；对于双变量，我们采用交互分析的方法进行百分比的交互分析，以检验职业、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要素对城乡数字鸿沟是否产生影响。

五、研究内容

(1) 重庆地区城乡居民信息获取能力现状：是否存在数字鸿沟？如果存在，数字鸿沟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2) 按照数字鸿沟理论，各相关因素（如经济水平、受教育程度、媒介接触率、媒介接触动机等）对重庆城乡居民信息获取能力的影响是怎样的？

① 研究将按照人口统计学特征，城乡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状况，居民受教育程度、媒介使用状况、消费结构，城乡统筹试点区域等分类标准进行区内分类，以确定重庆城乡的重点研究样本。

② 以问卷、访谈、实地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实证研究，探求城乡样本地区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和居民信息获取能力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式与途径，从媒介接触途径、影响度、传播方式、既有文化观念、生活方式、消费结构等多方面探求最为科学有效的信息传播方式，对缩小重庆市城乡“知沟”提出有益的建议。

六、概念界定

1. 数字鸿沟的定义

目前,学界对数字鸿沟的定义存在一定争议,而概念的界定和明确是我们研究的前提。对数字鸿沟的操作化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由阿奎特在《评估数字鸿沟:从实证分析的框架看信息与传播发展现状》(“Asse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Empirical analysis of a meta-analytic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development”)一文中提出的,数字鸿沟的衡量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包括用来传递各种声、光、图像、影响、数据的技术物理手段,如电话普及率、联网主机量、电话资费情况等),信息传播技术的拥有,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①。该指标体系对数字鸿沟的衡量是综合性的,较为全面地包容了造成数字鸿沟的各类因素。另外,我国信息产业部2001年7月29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National Informatixation Quotient,简称NIQ)作为数字鸿沟的综合衡量指标,主要由信息资源、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业、信息化人力资源及信息化环境等六大类近二十项指标构成。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造成数字鸿沟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信息技术客体(主要指固定、移动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物理量的差别,也包括了使用主体信息技术的差别。

在目前对数字鸿沟的研究基础上,课题组寻求的是多层次联结的方法,从多个角度探讨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因此,本项目将数字鸿沟定义为ICT在各个国家、地区、行业之间存在的差距的集合体,表现为个人和群体在ICT接入、使用、生产和应用创新上的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知识与信息的创造、理解、

^① 金兼斌:《数字鸿沟的概念辨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第1期。

应用和吸收能力的差距。许多研究将互联网应用差距等同于数字应用差距。但事实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并不能成为单一普遍的衡量标准,因此,在本研究中,数字鸿沟除了互联网这一普遍的衡量指标,还包括其他的信息传播技术工具,如有线电视、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方面的普及和使用所导致的差别。

2. 数字鸿沟的三个层次

金文朝等在《数字鸿沟的批判性再检讨》一文中把数字鸿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接入信息设备和信息,即信息的可接入性,指拥有信息媒体的接入能力;第二,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指与使用信息资源有关的所有行为,包括信息设备的操作,对软件的熟悉以及搜索信息的能力;第三,接入或欣赏信息价值的的能力,即信息意识(指使用者判断信息是否有价值的能力)^①。

基于此,课题组将城乡数字鸿沟具体操作化为“城乡数字接入沟”“城乡数字获取沟”“城乡数字使用质量沟”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城乡数字接入沟,即数字信息接入与使用渠道。数字信息的传播与接收不仅需要信息基础设施,而且对终端用户来说,信息设备的接入由硬件/软件、提供接入费用及服务费等多部分组成。以互联网接入为例,其接入价格是由互联网接入设备如计算机、宽带、软件等设备费用组成的。第二层次是城乡数字获取沟,即信息获得能力的差距,包括信息设备的操作与使用、对信息软件的熟悉度与搜索信息的能力。第三层次是城乡数字使用沟,即城乡居民的数字信息使用质量沟。课题组旨在通过对重庆市城市与农村在数字接入、数字获取、数字使用质量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分析当前重庆市城乡数字鸿沟的基本现状与主要特点。

^① 金文朝、金锺吉、张海东:《数字鸿沟的批判性再检讨》,《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

第一章 国内外城乡数字鸿沟现状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化在将整个世界联结为“地球村”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城市与乡村之间对资源、信息的激烈争夺。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信息化发展政策、城乡居民信息素养等都是造成城乡数字鸿沟的重要原因。

“城乡数字鸿沟”这个概念起源于 20 世纪后半叶。据资料显示，最早将“城乡数字鸿沟”作为衡量城乡两级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指标的，是美国商业部电信局（NTIA）于 1995 年发布的《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一文。文中指出，数字鸿沟与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指标密切相关，它所带来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让处于衡量指标优势条件的一方因某种便利，往往比处于鸿沟另一侧的人们有更多接触使用信息技术的机会。

城乡数字鸿沟在我国引起关注是在传播学科进入中国学界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陈继光于 1989 年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的《关于提高少数民族农村劳动者素质问题之拙见》中提出造成城乡劳动者素质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受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①。此后，将城乡数字鸿沟一词写入研究报告的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三农”问题视野下的数字鸿沟研究。最早

^① 陈继光：《关于提高少数民族农村劳动者素质问题之拙见》，《黑龙江民族丛刊》1989 年第 2 期。

的研究者是张勇，他在 2005 年于《中共济南市党委学报》上发表《“三农”问题视野中的数字鸿沟》。还有《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的“三农”透视》（张勇、刘伟、何桂端）等，文章从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谈起，分析生产力、社会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性，提出数字鸿沟在我国客观存在的原因。在衡量城乡数字鸿沟时，调查了我国城乡通信设备渗透状况（包括手机、互联网、计算机使用等）、城乡居民知能差别、城乡居民信息消费能力等指标^①。此后，有关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的研究逐渐增多。截至 2016 年 4 月 30 日，笔者在知网以“城乡数字鸿沟”为内容进行全文搜索，结果达 4 697 条之多。

对城乡数字鸿沟的显性研究结果的描述主要取决于对其衡量时所采用的操作化定义及概念化定义。最早给出“城乡数字鸿沟”概念的 NTIA 以城乡间固定电话及计算机接入差距为衡量指标，只关注了信息技术的接入维度。随着信息技术在城乡间的迅速普及和关于数字鸿沟现象研究的发展，研究者在接入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一利用维度。中国国家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给出的数字鸿沟定义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拥有和使用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计算机、固定电话、移动电话）方面的差距”。数字鸿沟内涵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扩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其定义为：“在不同社会、经济层面上，接触并获取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机会……”这一定义在以上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居民收入、消费水平等经济因素，扩充了信息技术接入维度。可以说，数字鸿沟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内涵，对其的研究伴随着信息技术发展的历程及研究者对数字鸿沟问题的行进性探索而逐渐深入。

^① 张勇、刘伟、何桂端：《我国数字鸿沟问题的“三农”透视》，《桂海论丛》2005 年第 3 期。

在实施到“数字鸿沟”方面，在郑宇、苑春强的文章《全球“数字鸿沟”问题》中，信息技术设施（个人电脑、因特网、传真机、移动电话、电视机数量），OECD 国家人均 IT 信息基础（人均基础设施支出、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例），技术人员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质量（收入、教育、年龄、种族、性别、地理分布、语言）等指标都是作者用来说明全球范围内“数字鸿沟”现象的依据。在《聚焦“第四差别”——中欧数字鸿沟比较研究》一书中，城乡计算机差距、城乡互联网差距、城乡电话差距这三个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物理数量被作为衡量欧盟内部“城乡数字鸿沟”的指标。书中指出由于“欧盟”（EU）内部人口分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的特殊状况，“城乡数字鸿沟”状况并不显著；而地区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数字鸿沟相对较大；更有城乡在信息技术接入方面同步发展，差异正在缩小。

国内研究方面，《中国城乡数字鸿沟问题研究》一文在描述中国社会数字鸿沟现状时，采用了信息工具的占有（城乡计算机普及率、固定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彩色电视机普及率 4 个代表性指标）和信息技术的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普及率和手机互联网普及率）这两个硬件和软件指标。在全面表述我国信息化进程的《2014 年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① 中，统计数据包括城镇、乡村非学生网民群体学历结构，未来上网意愿，上网行为，城乡手机网民规模，城乡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等。归结起来，也可以划分为信息接入占有和应用这两大指标体系。由此，衡量数字鸿沟的指标随着信息化进程推动，对数字鸿沟的研究涉及众多学科和层次，但基本指标体系均大同小异。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4 年第 34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